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

总主编 步平 沈强 邵铭煌（台湾）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

◎ 齐春风 郑忠 严海建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

总主编 步平 沈强 邵铭煌 (台湾)

抗日战争与 中国社会变迁

◎ 齐春风 郑忠 严海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 / 齐春风, 郑忠, 严海建
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 7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 / 步平, 沈强, 邵铭煌
主编)

ISBN 978-7-5126-3514-2

I. ①抗… II. ①齐… ②郑… ③严… III. ①抗日战
争—影响—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①K2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5234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70mmX240mm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40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 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26-3514-2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步平（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沈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
邵铭煌（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

执行主编 荣维木 罗存康 唐立馨

编委会成员 步平 沈强 邵铭煌（台湾） 荣维木 罗存康
李蓉 梁光玉 赵广宁 唐立馨 李鑫 赵晓丽

总序

步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开始，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便成为有觉悟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的不断思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从考证各个战斗、战役的成败得失，到分析评价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制定；从对战争场面和战争罪行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到对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升华，每个时期对抗战历史的总结与思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战后以来巨大变化的今天，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确定丛书的题目，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国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撤除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一步一步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

爱国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追求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终生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和理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

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民族团结，国力强大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发展则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从任何角度看，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使13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地生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更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全人类利益负有责任。所以中国的复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也在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更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当然需要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爱国主义的传统则成为我们民族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重要思想与精神资源。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各个领域都面临国际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如何正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中国需要用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丛书由 20 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 10 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促进和推动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够激励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海峡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

目 录

CONTENTS

- 1 上篇 人口与社会结构变迁
- 2 第一节 战时人口迁移方向
- 37 第二节 战时人口迁移数量
- 45 第三节 战时人口迁移状况

- 61 中篇 战时经济生活
- 62 第一节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城市经济的破坏
- 62 一、战火对城市的直接摧残
- 79 二、日军对城市工矿企业的侵夺
- 99 三、日军对城市商贸、金融的破坏与掠夺
- 116 四、日军侵略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120 第二节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
- 120 一、“三光”与“清乡”
- 129 二、粮食的掠夺与征收
- 142 三、战时税收状况
- 155 四、战时劳动力状况
- 172 五、战时的农村征兵
- 189 第三节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城乡经济生活的影响
- 189 一、国统区的城乡经济生活

- 208 二、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生活
221 三、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城乡经济生活

236 下篇 战时大后方的知识阶层

- 238 第一节 战时大后方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准
260 第二节 战时大后方知识阶层的社会生活
310 第三节 战时大后方知识阶层的转变

326 参考书目

- 326 一、著作
336 二、期刊

338 后记

上篇

人口与社会结构变迁

第一节 战时人口迁移方向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财产损失，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为了躲避战火，为了生存下去，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华北和东部战争区域迁移到西部乃至西南内陆地区。由此而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潮和难民潮，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现象。

全面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一”^①。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有一节为“国内人口迁徙”，里面认为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流动有三种情况：一是战争初起时敌占地区人口内徙，难民流亡，从战地前沿向大后方迁徙；二是大批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三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军不间断的“扫荡”与“反扫荡”中，根据地人口不间断地在一定范围里反复迁徙流动。张振鹏先生认为抗战时期还有一种人口迁徙，就是沦陷区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青年学生基本上是大、中学生，以高中生为主，他们不是在日本侵略军将到或刚到时逃出去，而是在日伪统治相对稳定地区的学校就读一段时间以后选择离开，投奔大后方，主要去西北西南各地。^②

其实全面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远比上述所列的复杂。从迁移的主体来看，既有难民的内迁，又有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内迁；从迁移的距离来看，既有迁到大后方的长途跋涉，也有乡间四郊的短途躲避；从迁移的方向来看，既有向西部大后方的迁移，又有向伪满甚至日本的迁移。当然，后一种迁移往往是受到了诓骗甚至是胁迫。

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

①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② 张振鹏：《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东北军重要将领万福麟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东北难民之入关者二万人以上，散驻平津一带，生活困苦，中央拟组救济会，迄今未成立。本人与汪院长一度商讨，汪允拨款救济。惟有一部分难民，因在关外置有田产，思乡情切，已先行出关，亦有数千人。”^①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

全面抗战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是随日军所至之处而定的，根据日本侵占中国各地区的情形，国内迁徙运动可大致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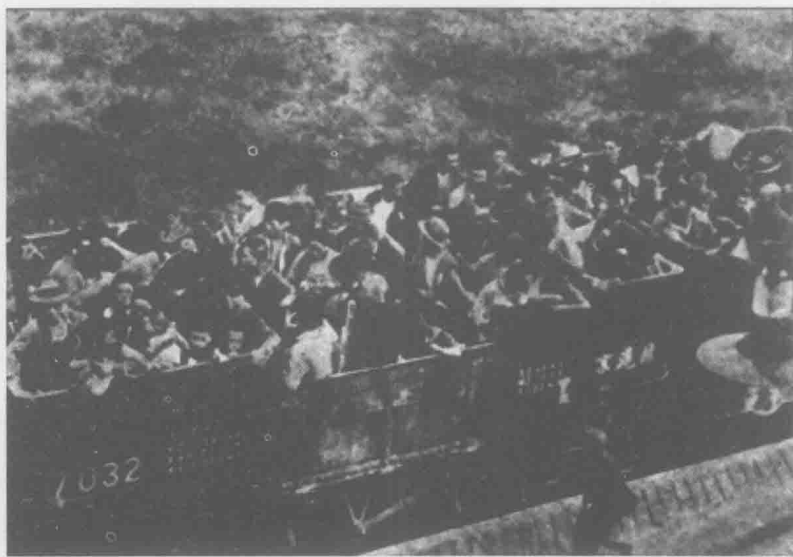
第一时期，从抗战开始至南京沦陷。

华北人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中国各大城市中以北平沦入敌手为最早——1937年8月4日，在未沦陷之前的两三个星期里，北平城里的有钱人家，深知日本统治朝鲜的残酷，因而与家人携带细软物品迁出北平城。直至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我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或因战略上有重要性的城市，都沦入敌手，其中计有：同年8月7日天津沦陷，9月24日保定沦陷，10月13日归绥（绥远）沦陷，11月11日上海沦陷及11月1日太原沦陷。

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不能通车，他们大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济南难民一部分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拥挤不堪。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① 《万福麟谈东北军队近况》，《申报》1933年12月9日，第5版。

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主要沿平汉路南迁，至郑州以后，有的继续迁往豫南和湖北，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有的沿陇海路迁往陕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的难民没有经济条件和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纷纷逃往山里，能够迁徙者多数流入西北各省。



平汉线上逃难的百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3卷（3），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3页。）

具体来说，华北地区的难民主要由三路向后方迁移。第一路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吴宓记述，郑州车站“时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①。对于这些拥挤在郑的难民，国民政府行政院赈务委员会所选派的平汉路难民救济专员做了不少安置和遣散工作，一部

^① 吴宓 1937 年 11 月 16 日日记，《吴宓日记》第 6 册，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54 页。

分被送往豫陕境内，“郑县难民招待所截至本月十一日共收难民一万三千六百余人，输送新乡、许昌、漯河等处约三千余人，输送洛阳、潼关、西安等处五千余人，其自动投亲友者约计三千余人”。另外有一部分难民则去往信阳、汉口、郾城等地，“接洽得悉郑县难民招待所遣送难民七百余人经汉口商会红十字会安置于贫民工厂……经由郑县送往（信阳）难民一千五百人，除已遣送淠川、罗山安插千余人外，尚有一百人未遣……因郾城交通甚便，难民逃往者颇多”^①。

第二路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一部分由大同沿同蒲线至太原，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进一步向陕西迁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有人西迁，吴宓 1937 年 7 月 28 日的日记中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 K 母女愿出京，只此一途”^②。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的电文也说道，“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者络绎于途”。这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至潼关转车，他们“多去西安，去豫鲁者少数”。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平绥路难民络绎逃包，现在五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经平绥路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 200 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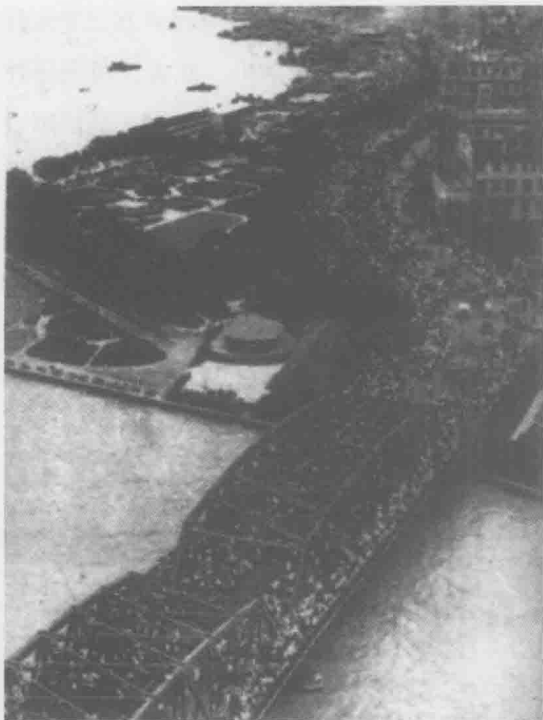
第三路，一部分有能力自动南迁京沪或武汉三镇的难民，其路线与清华教授吴宓、陈达等人的南行路线大体一致。据《吴宓日记》，吴宓的路线比较复杂，首先由北平乘火车至天津，然后经海路至青岛，再由胶济路到济南，转津浦路到徐州换陇海路车至郑州，再从郑州转平汉路到汉口，由汉口去往长沙的联大就职。有些欲到南京、上海等地的就可在徐州接着乘津浦路车南下。^④与吴宓多走陆路不同，陈达主要是走水路，从天津搭海船直接到上海，再由上

① 本段未注引文均转引自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87 页。

② 《吴宓日记》第 6 册，第 180 页。

③ 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87—88 页。

④ 参见吴宓 1937 年 11 月 7—19 日的日记。



日军侵占上海时，大批上海难民逃难的情景（孙东升、王根广主编：《见证抗日：1931—1945影像档案》，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海溯江而上，辗转到达长沙。^① 这两人的身份自然不同于一般难民，但他们的南行路线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除以上三种途径外，当然还有近距离的迁移。如平绥路战事紧张时，昌平、南口、宣化及卢沟桥一带的难民纷纷逃往北平；天津的租界也接纳了为数众多的难民，“邻近乡村的殷富住户相竞迁来避难”^②，以致人满为患。另外还有些战事进行地区的贫苦农民，为躲避战火往附近地区作暂时的流动，其具体情况就比较复杂而不易于了解了。总之，这些虽也是战时人口迁移的一部分，但由于他们有的并未向后方迁

移，有的则最终汇入经以上三种路径之一向后方运动的潮流之中。^③

华东区以上海为中心，在战火燃至上海之前，上海即已风声鹤唳。据竺可桢记载，1937年8月6日早晨至上海北站，发现“站上行李山积，出口处亦有行李堆积，致行人甚难出入，脚夫忙甚”。雇车至沧洲饭店，至则发现房间已满，“闻上海搬家者日来甚多，大抵由闸北、南市搬至租界，租界屋均人满”^④。

①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61—164页。

②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61页。

③ 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第89页。

④ 《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937年8月6日，第347页。

该地区的难民，主要分三路迁往后方。

第一路北上至苏北等地。淞沪战事发生后，上海、昆山、嘉兴、常熟等地的难民就或乘火车，或搭轮船帆艇，或徒步去往吴县，自吴县经京沪铁路，或者从水路经运河北上，至镇江后渡江到江都，然后从江都转输往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县（今泰州）、东台、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等地。使这些地方难民麇集，均在万人以上。据统计：“自8月13日起，至9月30日止，由淞沪宝山一带经京沪路各站辗转以轮船遣送至江北江都、仪征、高邮、宝应、淮安、淮阴、涟水、泗阳、宿迁、泰县、东台、兴化、盐城、阜宁14县者为253965人；自动奔走或搭雇帆船、连同转道津浦路由浦口渡江至江北六合、江浦、铜山、丰县、邳县、萧县、砀山、东海、灌云等县者为45360人，男妇老弱并计其299326人。”这一北迁的势头到10月仍是有增无减。^①

第二路沿沪杭甬线南迁，有的再转浙赣铁路去往南昌等地。经此路线者，主要是原籍浙赣等地的旅沪人口，因避难而回乡。

第三路沿江西上。这条线路在上海陷落后尤其繁忙，京沪一带人士与从北方南下京沪地区的人士多经此路内迁。陈达11月19日自上海到达南通时，与他同日到的“共四轮，约七千余人”；而与他同日到汉口的轮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驶，共载旅客及难民一万余人，据说近一星期来每日如此”。^②

在难民迁徙后方的同时，上海租界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难民。华北战事发生时，平津地区就有不少难民南下，到淞沪战事起，这场战火不仅殃及全体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虹口、闸北成了中日军队恶战之区，于是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的中外居民，能走的，无论贫富，便大批大批地涌向苏州河南两租界地。“外白渡桥”是沪东虹口、杨树浦过苏州河向南的最近通道，整个大桥以及外滩大道上，人流滚滚，“途中搬运箱笼之车辆，自早至夜，未尝停止”^③，“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

① 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第89页。

②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62、163页。

③ 《上海战局揭开后西北区巡视记·迁移仍盛》，《申报》1937年8月14日，第8版。